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最后的华尔兹

——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

[德]克里斯塔·卢夫特著 朱章才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最后的华尔兹

——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

● [德] 克利斯塔·卢夫特 著

● 朱 章 才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德)卢夫特(Luft,
C.)著;朱章才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

ISBN 7-80109-057-8

I. 最…

II. ①卢… ②朱…

III. ①德国问题-研究②政治事件-德国-史料

IV. D751.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467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丰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0 千字 印张:7

印数:1—5000 册 定价:8.5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克利斯塔·卢夫特是前民主德国最后一届政府——莫德罗政府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她在任的121天正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的关键时期。作者以亲身经历、见闻和感受生动而详细地描绘了两德统一的几乎全过程，回顾了与联邦德国政界、财界和新闻界高层人士多次会晤、频繁接触的情景，较为客观地道出了两德统一的喜与忧，并对前民主德国40年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自己的分析和评估。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6页）

作者在书中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材料对于研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承蒙作者欣然允诺无偿地在中国出版发行本书。在付梓之际，我们谨向克利斯塔·卢夫特

目 录

0.	出版说明	Ⅲ
1.	对自我的理解	1
2.	电话	11
3.	第一次会见	14
4.	别让我去参加党代会	19
5.	在旅途中经历的“转折”	25
6.	部长会议中的新人	30
7.	天生的和坚定不移的梅克伦堡女性	40
8.	没有部的“经济部长”	47
9.	沉重的遗产	58
10.	改革方案的起源	64

11.	与经济界领导人会晤	77
12.	接连不断的政治家访问	88
13.	与新闻记者的交往	98
14.	人民的反应	104
15.	圆桌会议及其棱角	111
16.	政府中的八个“反对派”	121
17.	出访波恩	128
18.	在群情激昂的民众中	141
19.	货币联盟的阵痛和恶果	151
20.	令人怀疑的类比	161
21.	曾有过选择的契机吗?	165
22.	现在怎么办? 必须行动!	174
23.	最后的华尔兹	181
24.	过渡议会的议员	193
25.	合并——终结——扫地出门?	209

给予我忍受无法改变之事的沉着；
给予我改变能够改变之事的勇气；
给予我区别不同事物的智慧！

古老的朝圣祈祷辞

1. 对自我的理解

在 我的任期行将结束的一次招待会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总理约翰内斯·劳问起我往后的打算。当我说到我想写一本有关我在政治舞台这段间奏曲中的经历、见闻和经验的书时，针对我的回答，他便狡黠地对周围站着的人说：“啊！我们大家也许要在这部著作中重聚啦！？”

实际上他当时指出了这本书的一个方面。我并不想按平淡的时间顺序来描述所发生的事件。我也不愿把这本书写成有关我所参与的事件的天衣无缝、枯燥乏味的报道。我也不奢望为自己的经济改革活动作严谨的科学总结。我的

主要心愿是叙述我周围的人所作所为的背景和情况；我自己的行为动机，指出人与人的冲突，说明我本人和绝大多数政府成员所受到的心理压力和所付出的辛劳。

我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抵制某些蜚语的流传，排除陈规旧习，记载下有意义的细节，根据个人的感受和亲身的经历来描写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志同道合的战友。我还要回忆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那些在德国历史最动荡的阶段中与我及莫德罗政府其他成员进行会晤或对话的忠诚而正派的伙伴。所有在两德统一过程中保持尊严、自重、正派而不是为党派私利狭隘地争吵不休、献媚和最后屈服的德国人，都应当得到重新认识。

我个人的履历表在“从事的工作”这一栏中，从1989年11月—1990年3月18日永远写上了“主管经济工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倘若有人在这之前几天对我这样预言，那我当时肯定会对这种预言轻蔑地置之一笑来加以否认。而现在，我则不得不与莫德罗内阁无法摆脱的支持与反对意见，同时还要与公正或不公正地归罪于该内阁的一切东西共存。

在翻阅那几个月的报刊和信件时，我看到这个班子的五花八门的别名，我本人毫无预见地属于这个班子。大选刚刚过去，在有的人眼里，它简直是“过渡政府、临时政府、不合法的政府”，也是“破产管理人”。在许多人看来，它过去是、大选后依然是“看守政府”。不少人把莫德罗政府直至“德梅齐埃移交班子”都看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一届独立的政府”。煽动者们骂它是一个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犯罪团伙领导的机构”。可是却没有人把这个后继内阁视为“外行内阁”。东方和西方的国家都把它视为那个时期“这个国家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唯一起作用的权力机构”。这个政府把自己理解为“人民政府和工作政府”，理解为“担负着民族责任的

政府”。这自始至终也是我的看法。

现在就对 1989 年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转折至 1990 年 10 月 3 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这个时期的莫德罗政府的历史地位进行公正而公平的评价尚为时过早。历史必将作出评价。从我这个直接参与者的经历体验中,也只能为作出这种评价添砖加瓦。

在德国统一的道路上,有两件事是莫德罗政府不朽的功绩,这是任何人都无可争辩的:其一,莫德罗政府以其政治信条“寻求意见一致、不使用暴力、力争实现民主化和稳定”,成功地阻止了 11 月 9 日边界开放后经常发生的威胁性骚乱,否则,安全部队与老百姓之间的流血冲突、内战一样的局势、激昂的情绪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与苏联士兵共同生活中的暴力活动、恐怖谋杀,或者有威胁性的供应紧缺,都有可能导人人人自危、分裂割据的局面,这对任何人都不利,谁都不喜欢这种局面。内政的不稳定、尖锐化和冷酷化,总会限制外交活动的余地。假如这样的话,欧洲的气氛,还有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合并,就会受到严重的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

其二,第一任转折后的政府认可社会的和以重视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使这种新经济体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众中,成为广大人民阶层看得见摸得着的“能登大雅之堂的”体制。在该政府就职时尚高速行驶的计划经济列车,更确切地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列车,受到了很大的制动,所以后来与市场经济轨道的碰撞,才避免了更多的牺牲。与旧事物的痛苦和旷日持久的精神脱钩以及心理状态上向新经济类型的转折,毫无疑问早在莫德罗内阁时期就开始了。以此确定了两个德意志国家经济并轨的决定性方向。

毫无偏见的历史编纂一定不会忽视这些功绩。与此相比，对它的所谓的犹豫不决及三心二意这一类批评，则是小题大作和苍白无力的。全盘否定这个班子，指责它无所事事、无能改革，实属高傲狂妄、大错特错。这类草率的评价，只要看看后来的事件进程就不攻自破了。

一个新政府享有 100 天的“宽容时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莫德罗内阁的任期，仅仅比 100 天稍长一点儿。根本谈不上“宽容”或宽宏大量的关照。在这期间，我们使若干事物走上了正轨，在其他地方要做到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需要多年时间。这对于所有的参与者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而又难忘的时期。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碰到的最严峻的挑战。

我本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过去所说过和做过的一切，都是襟怀坦白的、真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德国的国家统一是值得追求的，这些都是我说过的，这些话都是真诚的。然而，我并不愿意通过“突然方针”来实现这两点。它们造成的实际后果，比党派政治上的胜利更加重要。要是不重视长期性后果，短期胜利又有何用？我当时的建议是，从一切可以考虑的途径中选择一条尽量体现社会公正的、通向市场经济和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要是选择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是有可能借助“条约共同体”和“邦联”在为数不多的几年内达到目的的，这样做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就肯定会小得多。要是能把原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当作同等价值的、有自我意识的公民带到新的德意志国家中，而不是给他们带上各种“帽子”，更不是把他们革除于社会之外，就会给我们民族带来不利吗？不，恰恰相反！要是按我的建议行事，那么我们大概就已加入了经济统一的欧洲，而不仅仅只加入了原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经常想起孔子所说过的话：有三条道路能使人聪明地行事：

1. 通过独立思考，这是最好的道路；
2. 通过模仿他人，这是最容易的道路；
3. 通过经验教训，这是最痛苦的道路。

我认为，最后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命运！

当然，由于这期间出现的国际政治局势，特别是由于苏联内部各种对立势力之间的冲突的激化，所有认为德国如不尽快统一就没有机会的势力占了上风。诚然，这种看法很显然一方面纯属空想、投机。另一方面，苏联的改革派与强硬派之间的内政分歧，并没有随着德国所答应的解决德国问题的支付条件而有所缓和。经济高涨的联邦共和国，能促使经济受到削弱的苏联在对其有利的时刻同意德国统一。基本法的统一要求业已得到足够的考虑。苏联人的疑问和反应，依然如故。一位波兰新闻记者的评论，深深地触动了，该记者在1990年10月3日前夕这样评论道：

“苏联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却在和平中遭到了失败。”尊重这个国家那些饱经苦难深受其害的民族和民族群体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定将永远是我们德国人的一种内心需要。应该由此产生对我们、对欧洲及全世界有益的行动和行为方式。

从当年11月到来年3月这段时间，是这本回忆录的重点。但是，我也要进行某些个人的回顾与展望。对过去，对11月9日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况的回顾，主要集中在我本人所经历的时期。我本人的经历，很显然也是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数不少的公民的经历。这种回顾既不应该受愤怒、灰心丧气、思念故土或伤感情绪的损害，也不应当被自鸣得意所歪曲。这种回忆不是身居平安无事的高位的旁观者的看法。我曾亲身处于其中并与之息息相关。我作过某些贡献，也有过一些错误；我做了一些事情，也疏忽了某些

事情。

我认为我没有理由去认罪，现在这种认罪是时髦，这种认罪也是草率的或忏悔性的。但我很想进行解释。是的，我在其中成长、生活及工作过的制度失败了。这是令我这一代人痛心的，这更是令比我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人们痛心的！逐渐教育养成的价值体系，自己多年的经验世界似乎突然失效了。人们不禁要问自己：这一生是否白活了？我本人要理直气壮地说：不，没有白活！同时，我也非常清楚，今后很长时间，有人必定会不择手段，把“低劣自卑”、“二等货”这类帽子扣到“东德佬”头上。东德佬只能忍受这种帽子吗？尽管许多事情令人愤怒和失望，我要坚决地反对一切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40 年”这种不寻常的存在的划一的和片面的评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不仅仅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非法治的政权”，今天某些人就乐于这样来贬低这个政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是 1600 万人的祖国，她也是我的祖国。我从未感到她是一个政党及其盟友的统治地域。我也从来没有把她完全与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及其殷勤追随的小集团的肮脏勾当联系在一起。祖国的含义比这更为广泛：自己的童年，青春时期，大学学业，职业，家庭，朋友，熟人，同事。我的祖国曾取得过若干成就，也受到过挫折；有过欢乐也有过烦恼；有善良也有邪恶；有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也有值得留恋和弘扬的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单调、千篇一律；尽管有新闻媒体中所反映的种种不足；但是个性、创造性和敢于发表不同看法的精神绝对没有完全泯灭！虽然她的经济效益不高，具有难以把握的症状，然而，经济绝对不是彻底的“精疲力竭”、“荒芜”或者“疲劳不堪”。尽管有严格的指导、检查和监控体系，但是人们有自己行动的天地。最终还是各部门的领导人有权

决定在本部门是宽容还是思想恐怖占支配地位，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领导人可以火上浇油或灭火；可以对某些事视而不见；可以对一些事加以保护、阻止、低估、大事化小或小事化了；可以自己承担责任或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大胆直言；领导人可能盲目服从、服服贴贴、夸大其词、打小报告、揭发告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告密者就没有法官”这句谚语也是适用的！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或者会保护自己的良心和尊严。至于我本人，我对领导的规定和指令从来就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我怀着对自己负责这种责任感行事。幸好我的上级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他们看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而不仅仅只看形式的花架子，他们始终都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我所处的环境中的绝大多数同事，也是这样的好人。我有两个儿子，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是真诚的正直的。

我个人的干部档案中既没有离境申请书，也没有被捕或受过其他惩罚的记录。难道这证明我是盲目服从和完全入乡随俗吗？我在所有的岁月里都保持着我的批判精神，利用或创造了活动的余地。在担任对外经济系系主任和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期间，我始终把自己的学术工作理解为创造性的任务，完成这种任务，并为创立独特的理论格局而努力。思考先于信从。当然在我所发表的著作中，有个别著作，当我带着现在的经验财富和从现代的科学视野阅读时，感到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每个人都有失误和自我改正的权利。另外，严格的审查一直留下印迹。这不仅仅涉及到我参加编著的对外经济教科书。尽管如此，我的多数著作都既不带有简单化的特征，也不是充满意识形态原理，更不是辩护式的。与我的天性相一致的是致力于精确、合理、公正的研究，绝对不是欣快症。但我十分清楚，要使科学不降低为权力的奴仆，这要求多少力量和胆识啊！科学变成市场的奴仆这种危险今天被排除了吗！？

有些人为了个人的舒适生活而害怕承担过去的责任，或出于业务的原因而不想现在权当原民德政权的受害者，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令人同情的。同样，那些企图蔑视和诽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 40 年劳动、蔑视和诽谤她的一切，以及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她的一一切的局外人，是不足以称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人们曾参加了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试验，难道不是这样吗？并不是这些人自己选择了这种试验。他们在未事先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们个人对这种结果不负有任何责任）卷入了这场试验。现在人类又增加了这样一条经验：文明的更高级发展不可能沿着“现实社会主义”所走的道路达到目标。难道要为这条经验惩罚谁吗？许多西方的政治家用自己的言行不是也没有延长病人膏肓的制度的死亡期吗？

我们迄今为止的价值标准又如何呢？！从新的视野来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价值标准具有片面性。难道这能说明，全盘否定、抛弃这种价值标准，认为它是反常的、无意义的种种做法及看法是有道理的吗？这种动摇人心和自卑的行径，究竟对谁有利？物质价值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通过劳动获得个人财富来满足和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种可能性是对人的行动的根本刺激。旅游自由和获得信息的自由，是教育和生产率因素。在这一切事情上，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着决定性的、长此下去无法忍受的缺点。一种明显以其他的理想为特征的生活产生的儿童友好、文化发展、社会公正、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和男女性别差异一律机会均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难道因此就成为无用的、多余的了么？

尽管这些有价值的某些东西，在现有条件下表明是不能或不能完全实现的，但是，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错误的或无用的。单单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还不能构成全部生活。

我在1990年秋天写下了这些回忆。货币联盟之后几个月，德国的国家统一就得到了实现。西德马克支配了许多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思想和行动。两百多万人没有工作或打短工，而尽管如此，许多人的自信心、自尊心，却随着有了汽车凭证而不断增长。当时使用最多的概念是“清理”、“等候期”和“一根绳上的蚂蚱”等等。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综合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的人文、社会和经济学科以及系，被扫地出门了；医疗设施被关闭了；戏院、电影院、博物馆、交响音乐厅、出版社、报馆报社，甚至连柏林动物园都统统受到“灭顶之灾”的威胁。西方的管理经营人员，大批地进入原民德地区。一夜之间，原有的“店铺”变成了“商场”；“野外”变成了“庄园”。

新联邦国家的公民们想方设法攀登到将来税收制度的分枝后面；他们不得不准备忍受房租及其他收费的暴涨，并决定投诸多新医疗保险中的某种保险。刑事犯罪率日益增多，第一批无家可归的人到莱比锡火车站去栖身。救济饥饿者的粥棚和收容受冻者的取暖棚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变成了社会救济对象和申请住房补贴的人。以6位数计的被迫提前退休者，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废物。没有一个家庭能幸免遭受这种急剧变化的损害。失望情绪产生了，我本人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这种反思仍然应该写得不带任何愤恨，不带任何怨怒，更不能生气。当然在书中也不应当由于许多事情象预言那样发生而拍手称快和幸灾乐祸。我想十分简略地描述我的种种印象、经历和经验，它们是我在政府负责部门中共同经历过的、从民主德国的政治转折到她的国家机构职能终止这个德国历史上一去不复返的阶段中获得的。这个历史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既有希望又有忧虑，既充满很高的期待又有某些疑惑。这个历史阶段既短暂而又充满

无法描述的活力。这个历史阶段必将长时间地作出反应，因为预示着将来的幻景、未如愿以偿的愿望与梦想，必然会旷日持久地产生作用；因为 1989 年秋季的痕迹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人们过去和现在向我提出许许多多问题。在大街上，各种不同年龄的人仍经常自然地同我打招呼和攀谈。人们希望我对大大小小的事情作出回答，人们非常想知道，我是怎样卷入漩涡的，为什么有些事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决定的，我今天对种种事情的想法如何。我邀请读者同我一起交流思想。我想从纯个人的角度，尽量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日常生活和某些不寻常的事情。既要谈及奇特的、令人不快的、难堪的、令人痛心的和伤害人的事情，又要介绍令人愉快的、友好的、令人鼓舞的和发人深省的事情。

2. 电 话

19 89年11月14日下午，柏林经济学院院长室里的电话铃响了。部长会议的干部司司长要找院长听电话。他向我转达了汉斯·莫德罗对我的问候及其意图：莫德罗想在可能的情况下，同我于星期三，11月15日17点钟在施普雷河畔宾馆会面。

我看了一下日程安排就欣然同意了。

当我注意到为什么打电话的人是部门的首长而不是女秘书时，话筒早已放到电话机上了。于是，我马上就把它这个问题排除掉。

为什么会面地点又在宾馆呢？这也许意味着这件事是非官方性质的！这种解释令我欣慰。

究竟为什么要为这类细节伤脑筋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年的历史上，新当选的总理要立即求助于这个国家最大的经济科学机构，这尚属首次，这难道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吗？这是否是科学终究要在经济政策和实践中获得更